

■ 嫣然思语

北京的金秋 (外一首)

□ 郭晓勇

北京的金秋
丰盈中包裹着生动
红叶翩翩起舞
舒展美丽的面容
看紫禁城内
金黄与火红交织
岁月的光辉在绽放
照亮千载时空

长城蜿蜒连天地
好汉攀登似龙腾
时光悠悠,古今贯通
战乱烽火烙刻记忆
英雄荣耀,山川铭记心中

夜幕降临皇城静
霓虹映衬月光明
华灯初上的北京城
忙碌而又神秘
掩不住古韵悠长
掩不住岁月匆匆

老街巷陌唤往昔
胡同幽深情意浓
石桥流水古韵相守
情怀绵绵话过往
青山不老唤乡情

颐和园内湖光漾
琼楼玉宇林泉相映
静美时光长相守
古朴宁静,心之所向归处
历史瑰宝满园中

红叶如火耀秋空
皇城秋色舞秋风
古都魅力尽在眼前
风情万种美不胜收
香山浪漫火照熊

青石板道藏龙卧虎
千年轮回彰显文明
韵味悠长悠悠帝都
风华绝代令人醉
四九城里觅踪影

风中丝竹音韵传
红墙雅韵奏皇城
飞檐翘角写风姿
雕梁画栋,诗词赋
红墙绿瓦沁心声

文化璀璨如星辰
五彩斑斓映夜空
丹青妙笔写春秋
古都文化,灿烂而辉煌
发扬光大有传承

金秋的北京
牵挂在心里
牵挂的金秋
绚烂在梦中

红叶颂

寂寞于春的绿韵
包容着夏的炽热
不忍无边蔓延着晚秋的清冷
慷慨地燃烧自己
把美丽绽放
一片丹心拥抱初冬
萧瑟的霜夜过后
漫山覆拥着似火如霞
深红 浅红 大红 橘红
和着斑斓与梦幻
激荡着红的夺目 红的情怀
挥洒着霜染露冰后的坚定
一叶的红是个性
一树的红是魅力
一山的红则是壮美
是激情 是奋进 是热血般的赤诚
有人说深秋是燃烧的情愫
可这令人窒息的美艳
曾经演绎过多少选择的感动
舍弃了春的妩媚
珍藏起夏的骄阳
静候着冬的冰莹
以生命之源和顽强之躯
张扬高贵的绚丽
默守谦和的沉静
当人们的欢呼从秋的靓丽
转向冰清玉洁
倾尽全部极致炫目的红
心甘情愿地轻抚曼妙柔衫
带着随风飘舞的祝福
告别曾用仅存风韵
点缀过的大地和旷野
与丰沃的泥土相融
优雅地离去
不曾有任何约定
也不在意洁白的世界里
是否留下了自己红的记忆
这壮烈的生命之舞啊
让世界尽赏四季的和谐与坦荡
用博大和辉煌昭示
奉献的璀璨与永恒

(作者为中国外文局原常务副局长)

为后人开出一条治学的大道 (上)

——纪念顾颉刚先生

□ 杨牧之

新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在中华书局主持下业已出版13种,还有6种已进入编辑流程,完成可期,令人高兴。此时,我想起最早负责(1978年版)的“二十四史”点校本“总其成”的顾颉刚先生,颇多感想,略记其事,以为纪念。

读大学时便听说,顾颉刚先生说大禹是条虫子,很受人嘲笑。那时我想,这老先生大概研究糊涂了,就跟我一个师弟那样,拿着空墨水瓶去灌墨水(那年代都是这样,因为省钱),嘴里背着《庄子·逍遥游》,背完便往回走,到了宿舍才发现墨水瓶没灌。真成一个书呆子了。学术界还曾流行一个笑话,说某人研究李自成有没有胡子,长、短、多、少等等,还写了不少论文。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学者过于钻研,是否就钻牛角尖了?那时,我也把顾先生归入这一类。

后来,由国家统一分配我到中华书局工作。那是1968年,当时,中华书局隶属于出版口,出版口归原文化部管。1971年,中央下令恢复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老专家纷纷回来了,在干校的同志也一批一批地被调回北京。当然,当时恢复的只是“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其他业务并不在其列。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出版是毛主席亲自指示要做的。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程上马了。周总理亲自批示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其背景当然是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

后来,我看到出版口领导小组给中央的一份报告,时间是1971年5月3日。报告说:4月2日总理等同志关于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指示,我们及时向顾颉刚先生、上海的绳树山同志和中华书局的同志作了传达。又说:各史校点完毕,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审查定稿后,统由中华书局负责出版。报告的上方赫然一排红色大字,“毛主席批示:同意。”

这个情况对我的认识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到底还是有学问的人哪,有了大工程,组织上还是首先想到他们,信任他们,依靠他们来完成。任点校组长的白寿彝先生经常来中华书局,点校《魏书》《北齐书》《周书》的唐长孺先生,点校《宋书》《南齐书》的王仲荦先生,点校《金史》的张政烺先生、《辽史》的翁独健先生,点校《明史》的王毓铨先生、周振甫先生,点校《清史稿》的启功先生、王钟翰先生、孙毓棠先生,一般都住在中华书局,或者每天从家里到中华书局上班,我们每天都能见到他们。他们都是学界大师,回想起来,那时他们每天下楼上楼自己去打开水,拿着饭盒同我们一样去食堂排队买饭菜,向他们请教问题总能得到详尽的解释,即便启功先生也是谁请他写字他都答应,写不满意,一团,扔到纸篓里重写。我对他们仰之弥高,崇敬有加。可是,在中华书局我却从来没有见到“总其成”的顾颉刚先生。

1978年,这个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的最后一部《清史稿》出版了。它标志着这个伟大工程终于完成了。学术界极为兴奋。大家心里想,充满封建主义思想的古籍都可以整理出版,其他图书的出版大概为时不远了吧!顾颉刚先生专门撰写了《努力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1978年5月24日)上。这也给广大知识分子一个期盼:顾颉刚刚能上《人民日报》,知识分子可以安心开始自己的工作了吧?

1979年,机会终于来了。中华书局总



顾颉刚(中),谭其骧(左),侯仁之(右)在山东青岛考察。本文作者 供图

编室派我去看望顾颉刚先生,看看他手头在做什么项目,能不能交中华书局出版。

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40多年,但我与顾先生见面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住在北京西边,钓鱼台附近的三里河南沙沟。他听说我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十分高兴,非让我先坐在中间的沙发上,然后让人端来藤椅,他自己坐在我的对面,我怎么敢坐,急忙站起来请顾先生坐中间的沙发。顾先生笑着说:“不必客气,我是年纪大了,怕听不清你说的话,这样坐近一点。”

这样一个坐法,这样一句话,让我十分意外,也十分感动。那时我刚刚30岁出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刚刚开始编辑业务工作,而眼前则是学界泰斗,是大前辈,是我敬仰的先生,顾先生对一个年轻人这样谦虚,一下子把我和先生的距离拉近了。

在那次拜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顾先生的紧迫感。我问他,“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出齐了,一大使命完成了,下一步您打算做什么呢?我心想,这样一件伟业竣工了,总该喘口气,休息休息了吧?

没想到,顾先生一口气给我说了四五个大项目。他说,他最集中精力的大项目,是整理《尚书》。他说:“尚”是上代的意思,“书”就是历史简册。用现代的话说,《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由于它写定于两三千年以前,那时的语言与现代的语言距离太远,所以,已经很难读懂了,其中又有“今文”“古文”和“伪古文”等各种版本的问题,还有真的记录和假托的古史的争论,问题相当多。清人阎若璩作了《尚书古文疏证》,把“伪古文”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历代学者又在校勘和注释方面付出过大量劳动,解决了不少疑难。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把这些研究成果综合起来,进行科学的比较、分析、判断,所以,大家使用《尚书》这部书很感不便。顾先生告诉我,他16岁时便开始了《尚书》的研究,几十年来,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颇有新见。他早就计划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全部《尚书》用现代口语翻译出来,使读者从信屈鳌牙的古文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访问他的时候,顾先生在他的学生、社会科学

院历史所研究员刘起釭先生的帮助下,已整理完《尚书》28篇中的12篇。他们把其中的《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盘庚三篇校释译论》两篇,在《中国史研究》《历史学》上发表,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关注。

他又说,手头进行的工作还有这样几项:一是应香港三联书店之邀,撰写自传;二是继续编辑《史林杂识》,这部书在“文化大革命”前出了第一集,现在二到五集已大体就绪,只待编定;三是整理读书笔记。顾先生的读书笔记大约有200册左右,人们估计总有500万字以上。这些读书笔记是顾先生一生读书心得,“里面有许多是见闻所及的抄撮,有许多是偶然会悟的见解”(《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是一部丰富的宝藏。

“您不要着急,慢慢来。”我情不自禁地安慰老先生。

“不行,越慢越不行了,得赶快搞。”“你们年轻,还不理解老人的心境。我这几天腰疼,背也疼。开始,我不知是什么原因,看看日历,才知道交寒露了,是在闹节气。我年轻的时候,见到一些长辈,一到节气,就嚷嚷不舒服,我不明白。今天自己体会到了。”

“假如再给我5年时间,我的《尚书》可以整理完毕,我肚里的文章也写得差不多了。”

这些话仍在耳边,犹如昨日。顾先生沧桑之慨和追回失去时间的不已壮心给我极大的激励。当时,尽管顾老已86岁,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第一次拜访顾先生,便也是最后一次了。我们拜访他的第二年,1980年12月25日,顾老去世了。

二

日月如梭。顾先生风云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最让我感叹的是他的开创性。他是疑古派。怀疑,才去探究。探究,才建新说。

胡适坐在火车上在国外旅行,“一边是轻蓝色的镜面的湖光,一边是巍峨的岩石”,他怀念国内治史的朋友,在火车上写文章推荐他们的书。他推荐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说它是“中国史学界

陈老莲的“梅石图”

□ 路来森



资料图片

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号老莲,明末清初画家。陈老莲是中国绘画史上最善画石的画家之一。而且,陈老莲画石,喜欢与梅搭配,也只是“石与梅”,画面他物极少。最为人人知的,就是他的《梅石图》轴。

画面:石,两块,一大一小;梅,一株,一株老梅。石大者,底部盘厚,上则一柱耸起,微微左倾;小者,仅一拳,形如卧兔,似在抬首仰视大石;大石与小石之间,俯仰相就,形成一种稳定之势。石面,大多以干笔皴染而成,无窍,无穴,但皱痕道道,纹理分明,有波涛冲洗之痕迹;而且,石之皱痕间,青苔积厚,见得时间久远,故而,从整体上看,一大一小两块石头给人的感觉,是一派沧桑,旷日久远。一株老梅,自大石之盘厚的底部,挺然而出。梅干,粗大、苍老,书霜累累,是时间一寸寸钉下的痕迹;一些小枝,从主干上纷然而出,枝极细,细如针刺,仿佛这株老梅老得只剩下生命的硬度和力度了。梅,无苞无花,这是一株正在

积蓄力量、等待开放的老梅。梅虽老,但老得坚硬,老得倔强,老得有锋芒。因之,这株老梅,更像是一种老而弥坚、弥坚的人格力量的写照。

另一幅同名画《梅石图》,却又别具一番风致。

同样是:石二,梅一。同样是一大一小两块石头,但此画中的两块石头,却是多孔隙,而且还孔窍极大,整体看去,瘦削精巧,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米芾赏石之“瘦、透、漏”的三大特点。最重要的是,这一大一小两块石头,有形:大者,如奋蹄之马,姿态昂然;小者,则如一站立之犬,神态平静;一大一小,同样形成俯仰相就之势,可谓玲珑剔透矣。而石之边缘,又以湿笔浓皴而成,这就给两块石头增加了一份厚重感,一份凝重感,看上去,虽瘦削,却不单薄,石之硬、之坚、之厚重,得以存焉。

梅两枝,一上一下,主干隐去。两枝梅,都是从大石之孔隙中伸出,枝上又分出小

的一部革命的”“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他断言:治历史的人,想整理国故的人,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

这部书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顾先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顾先生在给钱玄同先生的信中说: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详细一说。它的含义有三点: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尚书·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实状况,但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古史辨》第一册《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这是大胆的革命思想,也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创见。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中国史观是“颠扑不破的方法”。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的古史学界,一般分为信古、疑古和释古三大派别,以顾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认为中国的古史并非早已如此,而是逐渐地、层累地堆砌起来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胡适说,崔述在18世纪的晚年,用了“考而不信”的一把大斧头,削去了几百万年的上古史,是很佩服的,但崔述还留下了不少古人帝王,凡是经书里有的,他都不敢动。而顾先生斧头更大,胆子更大,一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舜禹)都送上了封神台。胡适说:“顾先生的中国古史学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的评价是很深刻的。其实,顾先生的贡献就在于他在史学理念上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把古代的帝王圣贤都作为历史的文献去考辨,不迷信,不盲从,把对历史的认识推向新阶段。

当然也有人,《古史辨》的辨伪工作还没有超出旧史学的范围。但看问题不能离开历史。这一点蔡尚思先生说得透彻。他说,人们多只知道,在文学上以白话派而向文言派进行斗争,在哲学思想上以反旧道德派而向旧道德派进行斗争,是进步的一种表现;而还不知道在史学上以疑古派而向信古派进行斗争,以资产阶级的某些方法而向地主阶级的某些方法进行斗争,也同样是进步的一种表现。二者都是属于反封建的思想体系的。我想,千百年来经书当道,谁敢怀疑古帝王圣贤?但顾先生能够大胆地提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要大胆地怀疑,认真地辨别真伪,敢于在古史说教上开刀,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骁将。

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了,为什么顾颉刚先生好端端忽然提出“大禹是条虫”来。郭沫若在1930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诚恳地写道:“从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他)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知之明。”郭老非常赏识地说出他的看法: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确是个卓识。

(作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主编、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下”见明日04版)

枝三两,梅花盛开数朵,疏疏落落,灿然分明。有意思的是,上部一枝梅的枝条上,还站立着一只红嘴小鸟,白腹灰羽,嘴巴微张,似正在喳喳叫。

这幅画之画面,静中寓动,充满了生机感。而那孔窍中伸出的两枝梅,则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一句诗“犹有花枝俏”。那嘴巴微张的鸟儿,是在鸣春吗?

马嘶,犬吠,鸟鸣,或许,很快就春意盎然了——陈老莲,于一幅《梅石图》中,充满了期待。

那么,陈老莲为什么这么喜欢在绘画中表达“石与梅”的情趣呢?

朴素的解释:石,坚硬、厚实;梅,不惧寒冷,迎寒而放。物之品格,也就是人之品格,很大程度上,作为明末遗民的陈老莲,不与清廷合作,或许就是借“石与梅”之意象,来喻其挺然之姿、不屈之志。

但在这一点上,著名美学家朱良志先生的概括,似乎更有高度。他用了“高古”一词来进行表述:他认为无论是陈老莲的“石”还是“梅”,都具有“高古”的特性,“高”,就是超越时间;“古”,则是超越空间,陈老莲的“梅石”画,已然不是一般的写意画,而是在人格表达上,具备了超越“时空”的高度和力度了。

信然哉。